

回响饥饿：论内驱力衰退的发生机制及其教育意涵

儿童持续发出的初始信号长期得不到带着回响者自身形状的承接，「我发出信号能激起世界回应」这条最原始的因果感知环路因缺乏喂养而萎缩。

蔡彦 著 · 之13 · 教育发生学 · 早期互动 · 发表于2026年7月31日 · 约 2.2 万字 · 预备学员

摘要

本文提出“回响饥饿”这一新构念，指认一个在教育实践中长期被感知却未被精确命名的现象：儿童持续发出的、本应导向自主行动的初始信号，在亲子互动中长期得不到及时的、有情态意义的承接性回响，致使其“我发出信号能激起世界回应”这条最原始的因果感知环路因缺乏必要的反馈喂养而陷入萎缩。本文的核心论证包含三个层次。首先，通过与自我决定理论的“自主感”、依恋理论的“敏感回应”、Stern的“情感调协”、Tronick的“互动修复”模型以及Winnicott的“抱持”概念进行逐一对质，确立“回响饥饿”不可被还原为任一已有构念——它切割的是此前诸理论上、下两端均已精细概念化、唯独中间传递环节未被独立命名的辨析面。其次，通过对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与第三方裁判系统三种教养实践的发生学分析，揭示它们制造回响饥饿的具体过程：不是剥夺了一个现成主体的校准权，而是使那条原始回响链的系统性断裂成为一种慢性、静默、不被看见的结构性常态。三者并非三个并行的陷阱，而是共享同一种“可控性焦虑”的互构装置。最后，本文提出从“回应行为”到“回响场域”的实践转向，论证回响不是一种可被技术化操作的教学技巧，而是一种要求照护者首先恢复对自身内部信号感知能力的关系场条件——且这种感知能力本身也有其发生条件，并非某个等待被回归的“本真状态”。

关键词

内驱力；回响饥饿；主体感；承接性回响；发生学

一、引言：重新回到“第一声啼哭”被谁听见的时刻

在当代教育焦虑的中心，“如何唤醒孩子的内驱力”已然成为一个被反复追问却始终未被撼动的问题，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方法论产业——从动机访谈到游戏化学习，从代币奖励到成长型思维的培养——无不承诺能够找到通往孩子内在动力宝库的暗门。然而，在这些喧哗的承诺之下，有一个更根本的困惑始终未被正视为一个独立的谜题：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是“有动力但找不到方向”，而是“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有什么想做的”？

这不是一个关于“动力强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我到底想不想”中那个“我”是否真实在场的问题。一个孩子站在一堆玩具前，神情淡漠——不是他判断出“这些都不好玩”，而是没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有趣”的判断能够从他内部上升成一根足以推动身体向前走一步的指头。他的内部不是装着一个沉睡的火山等待喷发，而是火山口的岩浆冷却了，不再有新的热力从地幔深处涌上来。他用“随便”“无所谓”“你帮我选”来应对世界的邀请，不是出于礼貌或依赖，而是因为他内部那个负责生成“我想要”的装置，已经不运转了。[1]

这个装置叫什么？它如何被关闭？它能否被重新打开？

本文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但不是在“找出病因—设计干预方案”的常规框架内。以往多数解答共享一个未经审查的预设：我们一直默认，那个会“想”、会“要”、会“感到不对劲”的主体，是已经在场的。我们以为，教育的任务只是去“满足它的需求”“保护它的自主性”“修复它的创伤”。但本文要论证的是：在许多被判定为“内驱力不足”的孩子那里，那个我们假定的、已在场的主体，其实从未被成功地组织起来过。不是“它”丢了动力，而是“它”在应该被组织出来的关键期，长期处于某种结构性的饥饿状态——不是食物的饥饿，不是爱的饥饿，而是回响的饥饿。

这就是本文的核心命名：回响饥饿。它指向这样一种状态：一个孩子持续地、自发地发出一些本应导向自主行动的初始信号——一个模糊的兴趣冲动、一个“我想试试”的身体姿态、一次笨拙的探索动作——这些信号在亲子互动的关系场中，长期得不到及时的、有情态意义的、能够被孩子感知为“你的行动在我这里激起了波

澜”的承接性回响。于是，那个“我的行动能激起世界回应”的最原始的因果感知环路，因长期缺乏必要的反馈喂养而陷入萎缩。孩子从此不再相信，发出信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这个命名不是对已有的“自主感缺失”或“敏感回应匮乏”概念的升级包装。它切开的的是一个更靠前的辨析面。让我在此做出一个关键的澄清：动力问题与回响问题是两个不同层级的问题。动力问题问的是：“这个孩子为什么不想做这件事？”它的焦点在于行为选择层面的动机强弱。回响问题问的是：“这个孩子是否还相信自己发出的信号能激起世界的回应？”它的焦点在于那个能够产生“我想做”这个冲动的主体根基是否被成功组织。一个孩子可以被给予极大的自主选择权——自己决定练什么曲子、自己安排作业顺序——而依然在更深层上处于回响饥饿：他可以选择，但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选择在世界上激起了任何不可预测的、真正属于那个回应的他人所特有的波澜。他拥有选择的自由，却从未体验过“我的一个模糊冲动，让另一个人的眼睛亮了起来”的那种因果效能。动力问题关注的是“燃料是否充足”；回响问题关注的是“引擎是否被制造出来”。两者可以分离：一个引擎完好的孩子可能因燃料不足而暂时丧失动力，给他燃料就能重新发动；一个引擎从未被成功制造的孩子，即使燃料充足，也无法启动。

本文要做的工作，不是与现有动机理论争辩“内驱力究竟由什么决定”，而是向前推进一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个能够拥有内驱力的主体，本身是如何在一连串微观互动中被组织出来的？当这个组织过程本身失败时，会发生什么？这个追问，将把分析推进到“自主感需求被满足”之前的更底层地基——那个“校准者”本身的生成条件。

在此交代本文问题意识的直接来源。本文的基础工作受益于陈晓艳、高鹏、季春雷等研究者在教育观察与理论建构方面的先期探索，尤其是“亲自校准”概念的提出，为本文的问题意识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出发点：它揭示了当代教养实践中成人对儿童自我校准闭环的系统性替代，以及这种替代如何导致主体感的弱化。本文的贡献，是在这些前期工作的基础上，将分析推进到“亲自校准成为可能之前”的更底层——即那个“校准者”本身是如何在一连串回响中被组织出来的，以及当回响被系统性地抽薄时，又发生了什么。如果“亲自校准”追问的是“谁有权校准”，那

么“回响饥饿”追问的是“那个本该拥有校准权的主体，是否曾被成功地组织到足以接过这个权利的程度”。[2]

以下，本文将在第二部分完成与五个经典构念的逐一对质，确立“回响饥饿”不可被还原的理论地位。第三部分将对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与第三方裁判系统进行发生学分析，以“矛盾的累积与结算”为主线，揭示它们如何在微观互动层面制造回响饥饿，并论证三者构成一个互构的“可控性装置”。第四部分将从“回应行为”到“回响场域”的实践转向中给出方向性建议。结论与证伪条件、对“气质因素”与理论适用边界的严肃回应，以及一个必须被正面面对的内部悖论，将在第五部分展开。

二、“回响饥饿”：概念界定与不可还原性论证

2.1 回到“第一声啼哭”的原初现场

每一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都不是一个空洞的发声事件。它是这个生命第一次在全然陌生的世界中，发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强烈的信号。这个信号没有明确的内容，没有意向的对象，甚至没有“意图”可言——它只是身体感受到压力之后，被内部驱力推出来的一声表达。

然而，真正决定未来的，不是这声啼哭本身的强度，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有没有一个成年人，在接收到这个信号后，用身体、声音、表情给予了承接性回响——将婴儿抱起，让这个哭得浑身颤抖的小身体贴在自己胸口，用一种轻柔却坚定的语调说出：“哦，你醒了，你害怕了，我在这里。”

这套动作的实质，比它看上去所包含的要得多。它完成了一次最原初的因果性教学：你的信号，被世界接到了；你的信号，在我这里激起了波澜；你，是那个让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婴儿当然无法用语言理解这一切，但他的身体会记住：我发出信号 → 世界发生变化（被抱起、被喂食、被包裹）→ 我内部的紧张得到释放。这个闭环每完成一次，就在身体的神经回路中刻下一条细不可见的印记：我是一个能以行动影响世界的存在。

这就是主体感的最初种子。它不是某一天突然“觉醒”的认知，不是“我想通了我是谁”的哲学顿悟，而是在千百次最微小的信号-回响循环中，被身体用重复的经验默默凝成的、关于“我存在且有效”的基线信念。

此处需要一个发生学的澄清，以避免后续论证被误读。将“第一声啼哭”作为起点，是一种发生学的追溯起点，而非每次具体互动中的实际起点。在实际生活中，每一次“我发出信号→世界回应”的循环，并不需要从“无人承接”的原初状态重新开始。一个有着健康早期经验的孩子，每一次模糊的冲动升起时，他的内部已经携带着此前数千次信号被承接所沉淀的基线信念——“大体上，我的信号是值得发出的”。但这个基线信念本身，是在早期互动中被逐步组织出来的。本文追溯那个“起点”，是为了揭示这个基线信念的生成机制，而不是为了声称每一次新的冲动都需要重新经历一次“从无到有”的主体组织。日常生活中的信号发出，是在这个已被组织的基线信念之上运行的。本文要追问的，正是那个基线信念的生成机制本身——以及在回响长期缺失的条件下，这个生成机制如何受损、乃至失败。

2.2 回响饥饿的发生学界定

现在，设想一个相反的图景。一个婴儿哭了，没有人来。他的哭声从急促转为嘶哑，从嘶哑转为无望的沉默。他学到的是：我的信号，不能改变任何事情。这不是“被拒绝了”——被拒绝的前提是“有人听到了但选择不回应”。在这里，是信号本身沉入了真空，它没有在世界表面激起任何可见的涟漪。

这就是回响饥饿最原始的形态：不是食物没有被送到嘴边，不是身体没有被温暖，而是“我发出信号”这个动作与世界回应之间那条最原初的因果链路，从未被稳固地建立起来。

随着孩子长大，回响饥饿的形态会变得更加微妙，但本质不变。一个两岁的孩子指着窗外的鸟，发出“啊！啊！”的声音。他不是在索要一个名字（“那是鸟”），而是在发出一个分享性的信号——一个初生的、想与另一个人共同注视同一件事物的冲动。如果身边的母亲蹲下来，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说：“哇，一只鸟！它在飞呢！你看到了！”——这是一个承接性回响。它完成了三件事：（1）确认孩子的信号被接收了；（2）在接收的基础上，用更丰富的语言为孩子当下模糊的冲动赋予了可以日后被反思的形式；（3）将两人的注意力联合在同一对象上，创造

出“我们在一起看”的共有经验。这个回响不是答案，不是指令，不是纠正，而是一个有情态的承接——它让孩子内部的信号没有沉入真空，而是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激起了一道同频的涟漪，并带着这道涟漪返回到孩子那里。

回响饥饿，指的正是这种承接性回响的系统性匮乏。必须非常精确地区分：它不是“大人不理孩子”（那是忽视），不是“大人骂孩子”（那是否定），不是“大人夸孩子”（那是正反馈）。忽视、否定、正反馈，都是在“信号已被接收”的前提下发生的二级回应。而承接性回响，是那个更靠前的、只传递一个最简单的本体论消息的动作：“你的信号，被我收到了；它在我这里，产生了影响。”

这个动作的缺失，是一种特殊的饥饿——它不是食物的缺失，不是爱的缺失，不是肯定的缺失，而是那条从“我发出”到“世界回应”的原始因果感知链上，一个必要环节的长期缺位。它静默、不可见，但它的累积效应，会让一个孩子从内部关上发出信号的阀门。不是“我不想”了，而是“我内部那个‘我想’的冲动，在升起的第一秒，就已经学会了不去指望任何承接。它在生成之前，就已经被自我拦截。”

2.3 自我决定理论看见了什么，错过了什么

现在，让这个新构念站到既有理论的聚光灯下，接受最严肃的检验：它切开的辨析面，是否早已被其他理论更精确地覆盖了？

在动机心理学领域，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的地位无可撼动。其核心命题是：当个体的三种基本心理需求——自主感

（autonomy）、胜任感（competence）、归属感（relatedness）——得到满足时，内在动机便会蓬勃发展。其中，“自主感”被界定为“感到自己的行为是自我决定的，自己是自身行动的起源”。

SDT捕捉到了内驱力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它在一件事上保持了沉默——这不是它的缺陷，因为没有理论可以回答所有问题；但这恰恰是本文要切进来的位置。

SDT的“自主感”，描述的是行为发起环节的意志性体验：“我选择去做这件事。”但它不曾追问：那个能够产生“我选择”这种主观知觉的主体本身，它的产生条件是什么？

换句话说，SDT将自主感的满足设定为内在动机的燃料，但它默认那个有能力体验自主感的主体已经被给予了。它的理论起点是：这里有一个孩子，他可以在“我自己选的游戏”和“被老师强迫的作业”之间体验到自主感的差异。但本文要追问的是更靠前的一步：那个能够将自己体验为“一个可以选择、可以行动、可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因果性来源”的孩子，他是如何在生命早期的一连串微观互动中被组织出来的？如果这个组织过程本身失败了，那么自主感的满足便成了无源之水——你无法满足一个尚未被成功组织出来的主体的自主性需求。

这就是“回响饥饿”所切到的辨析面。它不是自主感需求未被满足的状态（那是“被控制”的体验），也不是胜任感或归属感匮乏的状态。它是自主感需求能够被经验到的那个主体的组织过程本身，因缺乏原始回响的喂养而受到损害的状态。自主感是“我在做我想做的事”；回响饥饿是“那个能够产生‘我想’、并相信‘我想’值得被世界承接的内部驱力源泉，正处于营养不良之中”。回响饥饿不是发生在“动机”层面，而是发生在“主体感的生成”层面。动机理论预设了主体；回响饥饿追问主体本身的组织条件。

让我们用一个具体的对比来钉牢这个区分。一个在父母高控制下练琴的孩子，可能体验到很低的自主感——他感到自己是被迫的，不是自己选的。这是SDT所描述的情形。但一个在父母“无条件支持”、从不强迫、总是轻声细语问“你想弹哪个曲子”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如果他的每一次选择都发生在一种父母早已预设好答案、只是等他说出来的微妙氛围中——他的话被听到了，但他的眼神从未在父母眼中激起过任何不可预测的波澜，他的冲动从未让父母偏离过既定的教养脚本——那么，从SDT的测量角度来看，他的自主感得分可能非常高：他确实在“自己选”曲子。但他的主体感深处，可能是一片沉寂。他没有被剥夺选择权，但他从未真正体验过“我的一个信号，让世界发生了一个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变化”。

这种孩子不会抱怨“我被迫练琴”，他会说：“我无所谓弹什么。”这不是自主感低，而是主体感的根基从未被夯实。SDT给了我们诊断前者的工具；回响饥饿试图诊断后者。

2.4 与依恋理论“敏感回应”概念的区分——兼论“硬场景”检验

一个更紧迫的概念对质对象是依恋理论中的“敏感回应”（sensitive responsiveness）概念。照护者能够准确感知婴儿的信号，并做出及时、恰当的回应——大量研究证实，这是婴儿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关键条件。一个警觉的读者会问：这不就是“回响”吗？用了一个新词，说的不过是旧事。

不。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辨析面差异，必须通过一个更硬的场景来钉死。

“敏感回应”的操作化定义，聚焦于回应行为在时间上的及时性与内容上的准确性——照护者是否在婴儿哭时快速回应？回应的方式是否正确匹配了婴儿的需求？这些行为指标可以通过观察编码被客观记录。但本文所说的“承接性回响”，指向的是回应行为的另一个维度：回应关系场中，是否被孩子主观地经验为“这个回响是我引发的——它携带着彼人被碰到时特有的、不可完全预测的情感标记”。它不是关于回应是否正确、是否及时，而是关于回应是否传递了那一条最原始的本体论消息：“你的行动，抵达了我——并在我这里，激起了只能属于你我的、这一刻的波澜。”

现在，让我给出那个必须被正面回应的“硬场景”：当全部符合敏感回应定义的条件都已满足，回响仍然可能缺席。

预设这样一个极其接近极端情况的场景。一位母亲，深谙依恋理论的教养原则。她的孩子的每一次哭泣，她都在三十秒内到场；她的每一次回应，都准确地识别了孩子的需求——饿了便喂，困了便哄，不舒服便换姿势。她的行为编码在“敏感回应”量表上接近满分。但是，在这全部的过程中，她做了一件事：她从未让自己的情感状态允许被孩子的信号真正扰动过。她的回应是一套精确执行的内化程序。她的声音平稳、表情温和、动作高效——但她的眼神深处没有因为孩子的哭声而起的慌乱，她的声调没有因为孩子破涕为笑而上扬，她的身体节奏没有因为孩子激烈的抗拒而出现一丝不知如何是好的停顿。她的回应，从行为指标上无可挑剔；但从承接性回响的角度看，她的每一次安抚都在传递同一条隐蔽的消息：“你接收到的是正确的照料，但却是一片无法被你搅动的平静水面。你的信号是有效的，但它的有效，是某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有效——它并没有真正地触动到我。” [3]

这种场景并非纯然的虚构。在高度教养焦虑和“科学育儿”盛行的环境中，一部分照护者确实可能将敏感回应操作作为一种精确的、可内化的技术。她们以此屏蔽了自己被孩子的痛苦、愤怒、混乱所扰动时产生的不适感。她们给予孩子的，是精准的功能性照料，而不是有情态意义的承接性回响。这正是Tronick等人在“面孔静止”实验中所揭示的更深刻的意涵：婴儿恐惧的，不是照护者不在场，而是照护者在场——她抱着他，在物理上完全安全——但她的面孔对他的任何信号都不做出情感上的反应。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就是承接性回响终极缺席的具象化。它不是“没有回应”，而是“你信号激起的所有波澜，都在我的内部被预先过滤掉了”。照护者或许并没有面无表情，但是，其内部已经形成了一个将自身情感与孩子信号隔离开的习惯化屏障，在相关表情等外显指标上看不出大的差异，却阻断了信号真正“碰触她内心”的机会。孩子接收到的，不是一个干净的共情，而是共情话语与照护者眉间、呼吸、肌肉紧张之间的微妙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孩子说不出来，但身体会感知。他感知到的不是一个安全的承接，而是一个打包成承接的功能性照料。那些只在行为指标上合格、却从未在承接性回响的意义上抵达孩子的照料行为，将在该维度上留下一个石沉大海的空白。

由此，我们可以划出回响饥饿与不安全型依恋之间的精确边界。依恋理论捕捉的是“我的照护者是否可靠地在我需要时回应我”的期待结构，关乎安全与信任。回响饥饿捕捉的是更靠前的一个环节：“我发出的信号，是否值得发？它是否具有改变世界的能力？”它关乎的是发出信号的意愿本身的命运。一个孩子可能拥有安全型依恋——他相信母亲在他需要时会来——但他依然可能在长大后的某个时刻发现，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的安全，来自母亲总在他表达需求后及时到场；他的空洞，来自他从未在发出信号的那一刻，体验到那种“我的冲动让另一个人眼睛亮了”的因果效能感。前者是回应可以给的；后者是回响才能给的。

2.5 与“情感调协”“互动修复”“抱持”的概念对质

情感调协。Daniel Stern的“情感调协”概念描述了照护者如何通过跨通道匹配——例如婴儿用脚踢玩具的节奏，母亲用声音的“嘀嗒嘀嗒”来匹配那个节奏的强度与时间形态——帮助婴儿将混沌的内部状态带入可分享的形式。调协的本质，是照护者用自己的表达通道来匹配婴儿内在状态的形式特征。这个理论与本文的核心直觉高度契合，但二者在强调的侧面上存在关键差异。Stern的调协强调的是匹配

与放大——照护者精确捕捉婴儿内部状态的波形，并将其放大返回。这是一种“共振”模式。但承接性回响强调的，是另一个维度：扰动性与不可预测性。回响不是精确复制婴儿的状态，而是让婴儿的信号在另一个人的心灵中激起一道特有的、不可完全预见的波澜。那道波澜携带着回响者本人的特质——母亲独特的语调、她此刻真实的情感状态、她对婴儿这个信号的个人化理解——是任何精确匹配都无法制造的。婴儿从回响中接收到的，不是“我被准确无误地反映了”，而是“我对她这一特定的个体产生了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带着她特有的、我无法提前完全猜到的独特形状”。正是这种不可完全预测的“被你碰到”的亲历体验，构成了主体感最深层的根基：我是一个能激起他人特有反应的因果性存在。

互动修复。Edward Tronick的“互动修复”模型揭示，母婴互动本质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破裂—修复”过程：在日常互动中，有约70%的时间母婴处于互动失调状态，但健康的母婴对等关系会迅速从失调中修复，重新进入同步状态。[4] Tronick强调，这种反复的“破裂—修复”循环本身构成了主体感发展的核心机制——婴儿从中习得，自己能够通过发出信号来修复断裂的关系。Tronick的焦点在于破裂发生之后的修复过程：他的理论预设婴儿已经拥有一个基线预期——“我的信号通常是会被回应的”。只有当这个基线预期存在时，婴儿才能感知到“破裂”的发生，从而启动修复行为。而本文关注的，是破裂被感知到之前的那个更原始的环节：信号发出与承接之间的那条链路，是否被建立起来。如果这条链路从一开始就因回响长期缺失而未被充分建立——婴儿从未形成“我的信号通常是会被接住的”这一基线信念——那么，他就无从感知“破裂”，更谈不上“修复”。“互动修复”预设了那条原始的回响链已经存在；而回响饥饿指向的，是那条链路本身未被充分建立的状态。

抱持。D. W. Winnicott的“抱持”概念强调，足够好的母亲提供的不只是对婴儿生理需求的满足，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抱持”——让婴儿的冲动、情感和未成形的内部状态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在那里被容纳、理解、最终被婴儿自己整合进自体。这个核心直觉与本文对承接性回响的描述存在深刻共鸣，但Winnicott的“抱持”是一个临床性的、整体性的隐喻，边界模糊，缺少可操作化与可辨别细分的维度。本文提出的“承接性回响”，正是试图在“抱持”这个宽泛概念覆盖的领域中，做出一个更精细的切割——“抱持”可以包含保护、容纳、理解、不侵犯等诸

多功能，而“承接性回响”仅指其中那一个特定的、最原始的传递：“你的信号抵达了我，并在我这里激起了波澜。”这个切割的辨析收益在于：它让我们能够讨论，为什么一个在某些意义上“抱持”得足够好的母亲（她从未让孩子感到不安全、总是温和地容纳孩子的情绪），她的孩子依然可能在更深的层面上，没有体验到自己的信号能够激起他人特有的、不可预测的波澜——“母亲容纳了我的一切，但她本人的内心，我从未真正碰触到。”这种体验，无法用“抱持失败”来精确描述；它是承接性回响特有的缺失。

2.6 不可还原性的锁死

至此，可将“回响饥饿”的不可还原性锁死在以下边界之内。

第一，它不可还原为自主感的缺失。自主感缺失是“被控制”的体验；回响饥饿是“我的信号发出去也没有用”的基线预设。高自主感与深层回响饥饿可共存。

第二，它不可还原为敏感回应的匮乏。敏感回应聚焦于回应行为的及时性与准确性，承接性回响聚焦于回应中被孩子主观经验为“由我引发、携带着回应人特有波澜”的侧面。在特定情境中（如2.4节“硬场景”所示），符合全部敏感回应指标的行为仍可能不提供承接性回响的生成性成分——回应的情感真实性、回应节奏中必须含有的非策略性停顿、回应内容超出功能满足而指向存在确认的维度——三者正是“敏感回应”的行为编码传统系统性地遗漏的侧面。这一可分离性经由该硬场景确立后，即锁死了“回响饥饿不过是敏感回应匮乏的另一种说法”的还原路径。

第三，它不可还原为情感调协的不充分。调协传递的是“我感受到你感受到的”，承接性回响传递的是“我被你碰到了，而且我的反应带着我特有的形状”。高精度调协如果不包含回应的不可预测性，便仍可能是承接性回响的剥夺——孩子接收到的，不过是一面真实得令人窒息的、毫无波澜的镜子。

第四，它不可还原为互动修复的失败。修复失败是“破裂之结无法重新建立同步”，承接性回响的缺失指向的是那条原始回响链尚未被充分建立，以至于“破裂”本身还不在于婴儿的经验范围内。

第五，它不可还原为抱持的失败。抱持失败是一个宽泛的临床描述；承接性回响的缺失，则是从抱持整体中切割出来的一个特定维度的匮乏——婴儿的信号是否被一个活人的心灵真正地“碰到”，并产生了激起对方特有波澜的效果。

一言以蔽之：回响饥饿，切割的是“我发出信号→世界回应”这条最原始因果感知链中，那个传递“你的行动已经抵达我”的环节的系统性缺失。既有理论中，这条链的上端（自主感、情感经验）与下端（敏感回应、正反馈、调协、修复、抱持）均已被精细概念化；唯独这个连接环节本身——那个传递着“我被你碰触到了”的中间传递过程——从未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构念加以命名和测量。 本文的贡献，即在于这片空白地的开垦。

2.7 一个补充性的锚定：为什么是“饥饿”

选择“饥饿”这个隐喻，是有意为之，需在此说明。

“匮乏”是静态描述：少了什么。“剥夺”是外部动作：被拿走了什么。“饥饿”不同。饥饿是一种驱动性的缺乏——缺乏本身会引发一种渴望、一种寻求、一种令人不安的张力。饥饿的人不只是“少了一顿饭”，他是被饥饿本身驱动着去做一些事来解除饥饿。如果长期饥饿得不到缓解，身体会启动代偿机制——代谢降速、肌肉消耗、最终内耗自噬。

回响饥饿在这个意义上是精确的。那声无人承接的啼哭、那伸出去无人共同注视的手指、那做出来无人真正看见的积木作品，不只是“被忽略的瞬间”。它们的积累，会生成一种慢性的、弥漫的张力：孩子内部的驱力系统，因为长期得不到它所需要的反馈喂养，而进入了一种类似于机体在热量匮乏时代谢降速的状态——信号依然在生成，但信号的强度被自己削减了，因为每发出一次都石沉大海的体验，将“发出信号”与“无意义的能量消耗”之间建立了越来越紧的联结。不是没有念头升起，而是每一次念头升起时，都习惯了在它抵达行动之前，就轻轻地把它按灭：反正，也不会有人承接。

这就是“回响饥饿”这一命名的全部内涵。它不是短暂的忽视，不是一两次的回应失败，而是一种慢性的、结构性的、“发出去也激不起波澜”的被给予状态。这个状态，在许多被判定为“内驱力不足”的孩子身上，早已沉淀为他们与世界打交道

的基本姿态——不是因为懒，不是因为缺乏意志，而是因为那个负责生成“我想要”的主体根基，已在漫长的回响荒原中，被耗尽了。

三、饥饿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三种回响剥夺机制的发生学分析

前文确立了“回响饥饿”的概念不可被还原为任一已有构念。现在，用这枚新的透镜，重新审视三种被广泛讨论却长期被误诊的教养实践：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第三方裁判系统。[5] 本文要论证的不是“三种机制都会导致回响剥夺”这一并列关系，而是它们共享同一种深层逻辑——一种对“可控性”的焦虑——并在此逻辑下相互支撑、相互正当化，构成了一个具有再生产能力的互构装置。

3.0 共通逻辑：可控性焦虑与回响的“不可控性”

在进入具体机制的分析之前，有必要先阐明三种机制共享的那条深层逻辑。承接性回响，在其最根本的特征上，具有一种不可控性——照护者无法预先知道孩子此刻的信号将在自己内部掀起什么样的波澜：可能是突如其来的烦躁、可能是被触动的心疼、可能是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茫然。真正有承接意义的回响，恰恰产生于照护者允许自己在这一刻被不确定性所穿透的那个当口。

但在当代教养实践中，一种深层焦虑正在蔓延：对教养过程本身“可控性”的焦虑。这种焦虑不同于对孩子安全的合理关切，它是一种更隐蔽的驱力——不是“我怕孩子受伤”，而是“我怕我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父母，我怕我做了什么无法预知后果的事”。当这种焦虑占据主导地位时，回响所携带的那种“不可预测性”便成了一种威胁。照护者开始倾向于用可预测、可控制、可被外部标准辩护的教养行为，来替代那些需要承受不确定性的承接性回响。

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第三方裁判系统，正是这一替代的三种典型形态。它们各自从不同入口切入，却共享同一个后果：那条从“孩子发出信号”到“世界发生不可预测的回应”的回响链，被一条“孩子发出信号→照护者执行预定程序”的控制链所替代。

3.1 认知平滑：从“一次短路”到“不想再启动”的矛盾累积

认知平滑的经典场景无需赘述：孩子正在笨拙地尝试让小车跑起来，遇到了困难，还在摸索；大人看在眼里，等不及，直接介入给出标准答案。此前的论述将这种介入定性为“对亲自校准闭环的破坏”。这个诊断成立，但它止于描述一个功能性中断。本文要追问的是更靠前的问题：在那个大人介入的当口，孩子内部正在运行的，不只是关于“这个轱辘安在哪”的认知性探索，还有一个更原始的过程在同步进行——他正在经验一种“我发出的信号能导向一个结果”的因果感知。他的皱眉、他的犹豫、他停顿下来的那个表情，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不是向大人发出的求救信号，而是他内部正在处理困惑的、可见的外部痕迹。这个痕迹的真实功能是：它在为他自己的下一个动作积蓄张力。困惑的持续存在，是一种内部的“势能”累积过程。

当大人突然介入，用一个“应该这样”覆盖了那个困惑，表面上是在帮助孩子解决认知问题，深层却发生了一次隐蔽的代谢失败：孩子内部那个“困惑→蓄力→尝试→反馈”的势能回路，在蓄力阶段被突然短路了。那股正在积蓄的、准备推向下一个行动的内部张力，没有机会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释放与转化，便被一股外部确定性强力消解了。这不是认知上的代劳，这是回响剥夺：孩子发出的不是一个明确的求助信号，而是一个指向内部认知活动的中间状态——这个状态，本应引来一个承接性回响（“这个好像有点卡住了？”），它承接孩子当下的状态，但不接管孩子下一步的动作。而“应该这样”，是一个替代性的动作，它把孩子中间状态的内在驱力直接短路掉了。

但到此为止，这还是对单次事件的描述。关键的发生学追问在于：一次认知短路，如何能够演变成一种不再启动的系统性信号降速？这中间不是一条平滑的、必然的退化斜坡，而是一个矛盾逐渐结算的过程。

矛盾的第一层：渴望自己解决与被预判为“不行”之间的张力。孩子在最初的几次认知短路后，并非立即放弃了尝试。他内部存在着一股与“被接管”相抗衡的推动力——那股源自神经系统的、朝向自主探索的本能推力。当他下一次面对类似困难时，这股推力仍在起作用：他想自己来。但同时，他的身体已经携带了上一次被突然接管的记忆——那种正在蓄力时被猛然抽空的不适感。于是，在每一个困惑升

起的瞬间，孩子内部出现了两股力量的角力：一股推他向前试，一股拉他提前收束。这个矛盾在初期是可感的——孩子会表现出一种微妙的犹豫，一种“我想要，但我不敢让自己太想要”的收缩。

矛盾的第二层：寻求承接的替代路径为什么走不通。理论上，孩子在被认知平滑反复短路后，可以有另一条出路：他不放弃自主尝试，而是尝试改变信号发出的方式——从“用笨拙的动作表达困惑”，转向“用语言寻求承接”（“爸爸，这个怎么弄？”）。这种转向，在健康的回响环境中是常态：孩子从非语言的探索信号，过渡到用语言请求有承接性回响的帮助。但在回响被剥夺的条件下，这条替代路径也被堵塞了。因为照护者对接到的“爸爸，这个怎么弄？”的回应，不是承接性回响（“嗯，你觉得卡在哪了？”），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认知平滑——直接给答案。孩子发现，无论他用什么方式发出信号——非语言的试探、语言的求助——那个信号都被同一种“外部标准答案”所覆盖，而不是被一个回应者真正承接和共同审视。于是，寻求承接的替代路径也失效了。

矛盾如何结算。当两股力量的角力反复出现，而替代路径又被封闭时，孩子的内部系统面临一个不得不结算的压力——持续积蓄一股注定被短路的能量，在生物能耗上是极其不划算的。将能量注入一个预期回报为零的行动，这在任何自适应系统中都是不可持续的。结算的结果，便是那条“推他向前试”的冲动的自我减频：那股张力在它还没有积蓄到足以驱动一个可见行动之前，就已经被系统自行消解了。孩子不再皱眉、不再犹豫、不再盯着卡住的地方发呆——他直接抬头看大人：答案是？这不是“学会了依赖”，而是“内部信号系统在体验到徒劳后，选择不再启动”。从外部看，他显得更“听话”、更“高效”；从内部看，那个负责生成“让我自己试试”的冲动的装置，已处于降频运行的静默状态。

3.2 时间格子化：从“体验截断”到“连续感丧失”的积累过程

时间格子化的危害，此前被诊断为“对内在节奏的暴力截断”——孩子在沉浸中被时间表叫停，导致其内部信号不被尊重。这个诊断成立，但本文要补充的是一个更深刻的发生学层面：时间格子化制造的终极伤害，不是某次单次打断，而是它使孩子从未获得一种根本性的时间经验——即“一件事的起、承、转、合完全由我的内部节律决定，并被完整地经历到底”的连续感。

这种连续感的深层功能，被严重低估了。当一个孩子从“想搭一座桥”的模糊冲动开始，经历了“稳不住→换积木→感觉对了→继续搭→搭完了”的完整过程，他经历的不只是一个作品的完成。他经历的是：我的一个初始念头，被我自己的行动全程承接着、推进着，直到它圆满地降落在世界里，变成一个被我亲手制造出来的实体。这全程回响的，不是某个外部的掌声，而是“念头”与“结果”之间那条通路，从头到尾没有被任何外部力量踏入。这个过程的“未被踏入”，本身就是对一个孩子最深层的确证：你的信号，不仅被世界接收了；你的信号，还能从头到尾地组织出一段只属于它自己的历史。这不是认知上的成功体验，而是本体论上的完成感——你的存在，在时间中展开了一段只属于你的弧线，它没有被任何力量截成碎片。

而时间格子化剥夺的，正是这个完整弧线被全程经历的可能性。同样，关键不在于描述一次截断的躯体化不适，而在于分析从反复截断到“不再生成起点”之间，矛盾如何累积与结算。

矛盾的第一层：沉浸的推力与“快要被叫停了”的拉力。孩子在专注中，他的注意力被当前活动紧密收束，他的内部节律正在匀速推进“下一步该试什么”的探索。这是一股强大的推力——沉浸本身即是奖赏，它吸引孩子继续深入。但同时，时间格子化在孩子的身体记忆中植入了一条与之抗衡的知觉：在你最投入的那一刻——在一段旋律刚刚开始被你自己弹得“对味”的那几秒钟、在你搭建结构勉强能保持站立你正要继续调整的那个当口——时间表上的那个切分点就会如期而至，把你从当下连根拔起。于是，每一次沉浸都变成了一次承受风险的脆弱投入：你越投入，截断时的痛越剧烈。推力与拉力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内部角力。

矛盾的第二层：防御性去沉浸作为适应性策略。当一个孩子反复经历“沉浸→被截断→痛苦”的循环，他的内部系统会自发寻找降低痛苦的策略。最直接有效的策略是：在沉浸刚刚开始时，内部就提前部署一层警觉——“别陷太深，一会儿还得走”。这个警觉不是语言化的认知，而是情绪的微调——把沉浸的深度轻轻地收回来一点，把对那件事的在乎程度轻轻地调低一点。这样，当截断到来时，痛苦会小一些。孩子仍然在做那件事，但不再是全身心投入；他的注意力已经从“沉浸在

活动中”分裂为“一边活动，一边监控活动的剩余时间”。他不再拥有对一件事从头到尾的完整体验——他只是在时间里“经过”一个又一个被预先切成块的片段。

矛盾如何结算。 防御性去沉浸，作为适应性策略，短期内降低了痛苦，但长期代价是致命的：它使得孩子从未经验过“一个念头被我全程承接到终点”的完整回响弧线。而那条完整弧线，恰恰是主体感最核心的生成场——每一次完整的起承转合，都在对主体发出同一条确证信号：“你内部升起的东西，值得被你自己护送到终点。”当这个确证信号长期缺席时，孩子的内部系统开始结算出一个更深的基线信念：“开始”这个动作，已经在经验中被绑定了一个必然的、痛苦的结局——在你最投入的那一刻，它会被叫停。 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这种反复痛苦的打击，最经济的策略，便是不再生成“起点”。不是没有模糊的兴趣闪过，而是每一个兴趣刚冒头的瞬间，就被“反正一会儿就得停”的预期轻轻地按了下去。孩子不是“不会玩”，而是“不想开始”。因为他内部那个能够生成“从起点走向终点”的冲动的信号系统，因长期从未被允许完成一次完整的旅程，而逐渐不再生成起点。

时间格子化与认知平滑在此处咬合。认知平滑剥夺的是信号发出后所得到的承接——它的伤害在于“我的信号得不到承接性回响，只会被外部答案覆盖”。时间格子化剥夺的，则更靠后一步——它伤害的是“我的信号即便开始被自己的行动承接了，也无法被自己护送到终点”。二者一前一后，分别破坏回响链的“承接端”与“完成端”，合力将孩子的内部信号系统驱入一种全面的降速与静默。

3.3 第三方裁判系统：当回响被“外部权威”接管

第三方裁判系统的危害，此前被诊断为“把活人的真实互动替换为冷冰冰的规则”——父母躲在“专家说”“学校规定”后面，不再和孩子发生真实的情感对撞。这个诊断成立，但本文要指出一个更隐蔽的、在承接性回响层面发生的剥夺。

当一个孩子愤怒地喊出“我不想再练琴了”，这个信号同时在做两件事。其一，它在表达一个明确的诉求——停止练琴。其二，它在发出一个更原始的试探：我此刻的愤怒，能在这个房间里激起什么？ 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重要。因为孩子自己并不完全清楚自己为什么不想练琴——是手酸了？是曲子太难？是刚才在学校发生了什么让他此刻心力耗尽？他的“我不想再练琴了”，是一个包裹着模糊内部状态

的、投向世界的试探性信号。他需要通过世界对这个信号的回应，来帮助他自己识别他内部到底在发生什么。

一个承接性回响，是父亲从报纸后面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用一种被打扰了但还愿意去理解的声音说：“听起来你很烦。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吗？”这个回应没有答应他的诉求，也没有拒绝他的诉求。它只是承接了他的信号，并让这个信号在另一个人身上激起了可以被孩子看见的真实波澜——父亲的困惑、被打扰的不悦、试图理解的意愿，三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真实的、复杂的、非预制的回响。这个回响，给了孩子一个机会，去在他自己内部也激起同样的波澜——先澄清自己的模糊状态，然后再决定下一轮要说什么。

但第三方裁判系统的在场，将这一切都短路了。当父亲回应的不是“我今天很烦”，而是“但是你自己选择的学琴，做什么事都要坚持”，他确实是在立规矩，但他同时做了另一件更隐蔽的事：他拒绝承接孩子的信号。他不是没有听见孩子的愤怒——他听见了，但他做了一个快速的转换：他把“我收到了你的情感，我在试图理解”这个承接动作，替换成了“我用规则来判断你的诉求是否合理”这个裁判动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拒绝——被拒绝的前提，是“你的诉求被接收、被考虑、然后被驳回”。而在这里，孩子接收到的不是“你的诉求被驳回了”，而是“你的信号根本未被作为情感信号来接收——它一发出，就被转送到了另一个处理系统。”

现在，让我们追问矛盾如何累积与结算。

矛盾的第一层：想要被承接的推力与“只会得到裁判”的预期。孩子内部有天然的、将模糊不安投向依恋对象以寻求承接的推力。这是他化解内在张力最原初的路径。但当他反复经验到——他抛出去的愤怒、委屈、困惑，每一次返回来的都不是“我听到了”，而是“这样对吗”——他的内部开始形成一种预期：我发出的模糊信号，不会引起承接，只会引起裁判。这股预期形成后，孩子面临一个两难：要么继续发出模糊信号并承受落空的挫败，要么改变信号发出的方式。

矛盾的第二层：内部提前审理作为适应性策略。孩子习得了一种新的沟通策略：不要在信号还是模糊状态时发出去。先自己在内部完成审理——把模糊的情感压成

清晰的诉求，把复杂的感受简化为可以说清楚的理由——然后再用干净的语言说出来。这样，至少他可以控制父亲回应的是什麼（是裁判，而不是承接），从而免于被告知“你的情绪不对”的挫败。这个阶段的孩子，表面上变得更“理性”了：他不再发脾气、不再嚷嚷“我不想练了”，而是平静地说“我今天有点累，能不能少练十分钟”。这被大人视为“长大了”“懂事了”，但它的底层结构，是孩子在防御性地把那个模糊的、等待被承接的自我，从人际互动中撤了出来。他只把那个已经自我审理完毕的、包装精致的自我，投向他人。

矛盾如何结算。当内部提前审理成为默认策略，孩子不仅不再把模糊的内部状态投向他人，他甚至不再允许自己内部去经验那个模糊区。因为经验模糊状态，是一种生理上不舒服的张力——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悬而未决感，天然地驱动一个人去寻求澄清和承接。但当他反复经验到“这个张力无法被他人承接”时，最经济的适应策略，就是不让那个张力产生——在模糊刚要浮现时，就迅速地用外部的东西（规则、任务、屏幕）填满它，不给它蔓延和积蓄的余地。这个阶段的孩子，不再感到“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焦虑——因为那个模糊区本身，已经被他主动关闭了。他告诉你他想要什么，而且说得清清楚楚。只是，他说的那些“想要”，不是从他内部长出来的；它们是从外部可得的选项中，被他用排除法筛选出来的。他不是表达“我想要”，他是在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这就是回响剥夺在人际层面最深的刻痕：剥夺的不只是回应，而是孩子敢于把自己模糊、混沌、不确定的内部世界暴露给另一个人的勇气。第三方裁判系统将亲子关系中那应该被保留的未知性与不确定性空间逐渐抹平，使孩子内部逐渐不再生成需要被承接的信号，而只生成可以被裁判的诉求。这正是内驱力最深的根伤——一个不再敢于把模糊的冲动暴露出来的人，也无法让自己真正地去追逐这个冲动。

3.4 “铁三角”的互构：可控性焦虑如何使三种机制咬合成一个装置

以上的分析分别剖开了三种制造回响饥饿的机制各自的发生过程。但它们并非三个孤立并行的陷阱。在当代教养实践中，三者共享同一种深层逻辑——对教养过程“可控性”的焦虑——并在这种逻辑的驱动下相互支撑、相互正当化，构成了一个具有再生产能力的互构装置。

时间格子化如何支持认知平滑。 当一个家庭的节奏被时间表切割成细密的格子，亲子双方都长期处于一种“赶时间”的应激状态。在这样的节奏中，每一个活动单元都被分配了有限的时序配额，超出配额即意味着侵占了下一个格子。认知平滑——“直接给答案”——在这种节奏中，不再仅仅是一种认知上的代劳，更是一种结构性必然：当练琴之后紧跟着作业、作业之后紧跟着睡觉时间，大人对自己说“我没有时间等你慢慢琢磨”这句话时，它不仅是事实陈述，更是被时间格子化制造出来的真相。时间格子化在物质层面为认知平滑提供了合理化的条件。

第三方裁判系统如何为认知平滑提供正当性辩护。 当父母直接用“专家说”“书上写着”“最佳训练方法是……”来回应孩子的困惑时，认知平滑就不是“我偷懒不想陪你探索”的不耐烦，而是一种被外部权威背书过的“我在科学育儿”。第三方裁判系统的在场，使认知平滑从一种即时的冲动行为，升格为一种“有理论依据的教养决策”。父母在内心告诉自己：“我不是在敷衍他，我是在用最有效的方法帮助他。”这种自我叙事，使得照护者免于面对一个更诚实的现实：她之所以选择给答案，而不是承接孩子的困惑，部分是因为承接困惑意味着允许一段不可预测的探索时间，而她当前的内部状态没有足够带宽承受那种不确定性。第三方裁判系统提供了一种免罪的叙事。

认知平滑如何使得时间格子化变得可接受。 反过来，当孩子已经习惯了每次困难都被外部答案快速消解时，他的内部不再产生那种需要长时间沉浸、独自克服困难的驱力。他变得“配合”——快速完成一项任务，安静地等待下一项安排。一个“配合”的孩子，使时间格子化的运转变得更加平稳：没有抗议、没有拖延、没有意外。认知平滑在主体层面为时间格子化的顺畅执行铺平了道路——它消解了孩子身上那些会打乱时间表的内在驱力。

三者如何围绕“可控性”形成一个闭环。 时间格子化试图控制的，是时间的不可预测性——让每一分钟都有预设的去处，从而免于面对“一段空白时间该做什么”的不确定性。认知平滑试图控制的，是摸索过程的不可预测性——让孩子直接抵达正确答案，从而免于面对“他卡在那里、我不知道他要卡多久”的不确定性。第三方裁判系统试图控制的，是人际对撞的不可预测性——用外部规则取代真实的情感交涉，从而免于面对“如果我此刻表达真实感受，会引发什么”的不确定性。

三者合在一起，试图将亲子关系中所有可能引发照护者内心焦虑的不可控因素，统统纳入一套可管理的系统。

然而，这个可控性装置越是有效地运转，它就越在系统地抽薄那一条恰恰需要“不可控”才能生成的回响链。承接性回响之所以是有承接意义的，恰恰是因为它发生在照护者允许自己被不确定性穿透的那个当口——允许自己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允许自己此刻的感受被孩子打破、被重塑。一个竭尽全力追求可控性的教养装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根本上切断了回响的生产条件。

三种机制不是三个分开的陷阱；它们是一个咬合的、制造回响饥饿的装置。它们并非以“我要剥夺孩子的回响”为意图，而是以“我要成为一个可控的、不出错的、不被焦虑袭击的合格照护者”为驱动。回响饥饿，是这个装置在生产“安全感”（对照护者而言）的同时，被连带着制造出来的副产品——一种慢性的、静默的、不被指认为伤害的伤害。

四、从回应到回响：实践转向的可能性

前三节完成了一次从现象到机制到结构的发生学追溯。现在，必须面对一个不可能回避的实践性问题：如果回响饥饿是慢性的、结构性的、难以察觉的，那么教育者可以做什么？

本文无意提供一份“十大回响技巧”的操作清单。那将背叛回响概念的本性——回响不是一种可以按手册执行的技术，它是发生在特定关系场中的、携带情态温度的承接动作。它无法被预制；它只能被允许。但本文可以提出一个方向性的实践转向：从“回应行为”到“回响场域”的转换。

4.1 “回应”与“回响”的本质区别

大多数教养建议，聚焦于“如何回应孩子”——倾听八法、我-信息、正面管教的话术。这些建议的共同预设是：回应是一种可以独立优化的教养行为。只要母亲学会了“当孩子有情绪时，先共情再引导”，只要父亲学会了“当孩子求助时，不要直接给答案，而是问他你怎么想的”，回应的质量就提升了。

但这些取向忽略了第三节所揭示的结构性现实。当母亲内心正在为即将迟到的钢琴课焦虑时，她的“共情”再熟练，也是在与另一个更强大的内部驱力对抗。孩子接收到的，不是一个干净的共情，而是共情话语与母亲眉间僵硬之间的微妙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孩子说不出来，但身体可以感知。他感知到的不是一个安全的承接，而是一个被打包成承接的催促——母亲在“完成”一个叫“共情”的动作，然后准备进入下一个议程。

回响不是回应的一种优化形式。回响是回应发生的场域条件。它像是一间房间的温度。如果你在冰窖里，你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温暖”的措辞，但你身体传达的冷，还是会盖过话的内容。如果你在温暖的房间里，你哪怕只说了一个“嗯”，那个“嗯”里携带的全身心的在场感，也是温暖的。

所谓“回响场域”，指的是照护者本人所处的一种内部状态。在这个状态中，她的注意力不是分配给了“我接下来要说什么”的任务监控，而是还给了“我此刻正在感受什么”的自我觉知与“他此刻正在向我传递什么”的接收性开放这两者之间来回游荡的、非强制性的节律。正是这种内部节律，使得孩子发出的模糊信号，有了一段足够宽裕的时间窗口，去在照护者心里慢慢沉下去、激起涟漪、再浮上来。回响的具体话语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回响之前，有过那么一个停顿——一个没有被目标导向的议程填满的停顿。

4.2 回响场域的实践锚点：接通自己，才能承接对方

由此引出一个反直觉的实践结论：提升回响质量的第一件事，不是观察孩子，而是照料者恢复对自己内部信号的感知能力。

但这立刻引出一个需要被严肃对待的发生学追问：这种“感知自身内部信号”的能力本身，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一位母亲自己在童年就经历了回响饥饿——她自己的信号从未被充分承接——那么她可能从未发展出稳定的自我信号感知能力。她与自己内部“我想休息”“我烦了”“我此刻需要安静”的信号之间，一直处于长期的脱离状态。一个听不到自己内部信号的人，不太可能听到孩子那些微弱的、模糊的、尚未成形的信号。不是她不想听，而是她的接收器从未被制造出来。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容易滑入“回归叙事”的陷阱。本文第三稿曾使用了“恢复感知能力”的表述——这个措辞暗示，存在着一个曾经完好、后来被遮蔽的“本真自我”，实践的目标就是向内回归它。但这是发现学的幻觉。发生学的立场是：如果一个人在童年从未被承接性回响充分组织过，她就不曾拥有过一个稳定的、能清晰感知自身内部信号的“本真状态”。“恢复”无从谈起。对她而言，出路不是向内回归某个不存在的遗失之物，而是向外构建新的回响场域——在一段新的关系（治疗关系、支持小组、一段有承接力的友谊）中，让她那些从未被承接过的信号，第一次被另一个人的心灵真正地“碰到”，从而启动一个迟到的、在关系中被重新组织的主体化过程。这种“接通自己”的能力，本身也必须在一种被承接的关系场中才能生长——它不是一个人的向内回归，而是两个人在对话中共同建构出来的。

回响场域的第一条实践锚点因此不是“去学一个更好的共情技巧”，而是“先允许自己停止做一个功能性的回应机器”。先花五分钟，在回应任何外部需求之前，自己坐在椅子上，什么都不做，只是让身体里的各种感受浮现出来，不去评判它们、不去赶走它们。这个看似与教育毫无关系的动作，恰恰是回响场域的启动键：它让你回到那个“我能感知我自己”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正是承接另一个人的感知的基本前提。对于那些从未被充分承接过的照护者，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外部支持——但这并不改变其基本方向：感知自我的能力，不能在孤独中被“恢复”，只能在新的回响关系中被“组织”。

4.3 教育者的角色转换：从回应的质量控管员，到场域的看护人

在这个转向中，教育者的自我角色也需发生转换。我们太习惯于做一个“回应质量控管员”——我这次回应好了吗？我没控制住情绪，我毁了，我是个失败的父亲。这种自我审查，本身就是在把“回应”当成一个需要追求正确答案的绩效目标。但回响不是正确答案，回响是在场的副产品。

一个不在审查自己、不在计算后果、不在回想书上理论的教育者，他此刻的注意力是自由的。这种自由，使他能够被孩子突然的情绪变化真正地“碰到”——不是用准备好的话术去接住，而是用自己的全部身体和情感，去承接那个扑面而来的、不可预测的生命信号。被承接的感觉，孩子说不出来，但他们会在身体里知道。他们

知道的那一刻，往往不出现在我们说了最漂亮的话的时候，而是出在我们愣在了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却抱着他们没松手的那一刻。

4.4 回响场域的可观察标志

为了避免“回响场域”沦为一个模糊的诗意概念，这里给出一些可观察的结构特征。在微观互动层面，回响场域的特征不是照护者说了什么，而是互动中出现了以下迹象。

第一，存在一个未被打断的停顿。 回响场域的标志特征之一，是“接住与回应之间有一个间隙”。在这个间隙中，照护者没有急于填补沉默，没有急于转向下一个议程，而是让孩子的信号在空中停留了一下。这个停顿在时间上通常是短暂的——照护者在接收到孩子的信号后，没有立即给出一个准备好的回应，而是先让那个信号在自己心里激起一道真实的涟漪——可能是困惑、可能是被触动的情绪、可能是一时不知道说什么的空白——然后再从那个被触动的位置出发，给出一个带有其个人特有情感色彩的回应。相比程序化的、立即给出的正确回应，带有停顿的回应更可能被孩子经验为“我被一个真实的人接住了”。

第二，照护者在回应中注入了自己的情感标记——哪怕是不完美的。 这意味着，回响不是“正确的回应”，而是“带有你个人印记的回应”。如果孩子感到沮丧，而你在回应中不仅传达了对他的理解，还夹杂着此刻真实的一点困惑（“我也不确定为什么你觉得这么难……”）、一点真实的被触动（“你说的时候，我感觉心里也揪了一下”）、或者一点真实的个人联想（“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那么你的回应不仅是在告诉孩子“我理解你”，更是在告诉他“我被你碰到了”——并且让他看见，你是如何被碰到的。

第三，回应的节奏与孩子的节律之间，存在一个有弹性的对话关系，而非单向的“接收—输出”。 孩子的信号不是一次性的“请求”，而是随着互动展开而动态变化的；回响也相应地随之调整，形成一种你来我往、共同塑造的对话节律。这种节律可能是不整齐的、有时会有重叠、有时会有沉默——但它不是机械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回合制，而是两个人在共同调节一段处于流动中的互动。当这种节律存在时，孩子经验到的不是“我说了什么，然后大人给了答案”，而是“我和这个人在一起，共同经历了一段有节奏的互动”。

这些特征，为教育者提供了一个可自检的清单，而不是一份“正确回应的话术指南”。[6] 自检的目的，不是给回应打分，而是帮助照护者觉察自己在互动中的状态——这个觉察本身，就是回响场域的一部分。

五、结论、反驳回应、边界与证伪条件

5.1 本文核心论点的总结

本文的核心工作，是在既有“内驱力被剥夺”的论述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命名了一个更底层的发生学现象：回响饥饿。它指的不是孩子失去了什么已有的动力，而是那个负责生成“我想要”的主体本身，在亲子互动中因长期缺乏承接性回响而未被成功组织起来的状态。这一命名，使我们可以将被广泛讨论的三种教养破坏机制——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第三方裁判系统——放入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中，看清它们最深的伤害，不在于夺走了一个现成主体的“校准权”，而在于它们使那条原始回响链的系统性断裂，成为一种慢性的、静默的、不被看见的结构性常态。三者并非三个分开的陷阱，而是共享同一种“可控性焦虑”的互构装置。在实践层面，本文提出了从“回应行为”到“回响场域”的转向，论证了回响不是一种可被技术化操作的教学技巧，而是一种需要照护者首先恢复对自身内部信号感知能力的关系场条件——且这种感知能力本身也有其发生条件，并非某个等待被“回归”的本真状态。

5.2 对气质因素的回应

本文必须正面回应一个可能的理论挑战：气质因素的干扰。一个严肃的反驳是：如果孩子天生气质不同，有些孩子天生就“发不出强信号”或“对回响不敏感”，那么回响饥饿理论的解释力就被削弱了——那些看似回响饥饿的孩子，可能只是气质上倾向于低反应性、低社会导向。

本文对这一反驳的回应分为三层。

第一层，理论定位。回响饥饿不是一个“气质类型”的命名，它描述的是一个互动的发生过程。无论孩子的天生气质是“高反应性”还是“低反应性”，回响饥饿的核心机制——信号发出后，世界没有承接——都可以发生。一个高反应性的孩子可

能发出强烈的信号，这些信号落入真空；一个低反应性的孩子可能只发出微弱的信号，这些信号没有被照护者捕捉到。两种情形都可能导致回响链的断裂。气质影响的是信号的初始强度，而非承接性回响缺失这一结构特征的致病性。

第二层，实证区分。如何在实证研究中区分“气质导致的低信号发出”与“回响饥饿导致的信号降速”？本文提出一个核心的判别指标：信号的动态变化轨迹。如果一个孩子在所有情境中都持续发出低强度的信号，且这种低强度从他生命的最早期就稳定存在、不随照护者回应质量的变化而变化，这更可能被归因为气质。如果一个孩子在某段时间内曾经发出过较强的信号（如学前期曾有旺盛的好奇心和主动发起的行为），但信号的强度和频率随着时间推移而系统性下降，且这种下降与照护者承接性回响的缺失存在时间上的共变关系，则这更可能被归因为回响饥饿。换言之，气质是一个稳定的基线；回响饥饿是一个动态的下行过程。纵向追踪信号强度的变化轨迹，是区分二者的关键。

第三层，气质的调节作用。气质可能调节回响饥饿的易感性。本文提出一个待检验的假设：高反应性、高社会导向的孩子，可能更容易陷入回响饥饿，因为他们对回响的“营养需求”更高。他们发出的信号更强烈，对回应的期待也更高；当回响长期缺失时，其内部信号系统的降速可能更快、更剧烈。而低反应性的孩子，由于信号本来就微弱，回响的缺失可能被更晚察觉——他们可能不会表现出明显的“信号降速”，而是一开始就没有建立起“发出信号是值得的”这条基线信念。这两种路径导致了相同的结果——一个不再相信自己能激起世界回应的孩子——但发生机制不同，干预切入点也因此不同。高反应性孩子的回响饥饿，修复重点可能是重建已被破坏的信号—回响环路；低反应性孩子的回响饥饿，修复重点可能是帮助照护者更细致地捕捉那些微弱的、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并给予有承接性的回响。

5.3 理论的适用边界与自我局限

本文的论证边界是清晰的。

第一，本文侧重于描述一种理论上的发生机制，即在回响长期缺失的条件下，主体感的组织过程如何受到损害。这里所说的“组织过程”，指的是在反复的、有条件性和张力累积的互动中，那些使孩子逐渐将“我发出信号—世界回应”这条因果环路内化为基线信念的微观过程。这一机制的具体发生速率、修复可能性、在不同气

质孩子身上的差异表现、以及是否存在某个发展阶段的“关键窗口期”，尚需细致的纵向观察和临床研究来进一步充实。本文所作的，是提出一个可被检验的理论框架，而非宣示一个已完成的实证发现。

第二，本文没有否认其他因素——先天气质、学校环境、同伴影响、数字媒体、社会经济压力等——在内驱力衰退中所起的作用。回响饥饿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在某些案例中可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文声称的是：在那些“明明物质条件优越、家庭关系和谐、学校环境正常，孩子却呈现出根本性的无动力状态”的案例中，回响饥饿可能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候选解释。它被低估的原因，部分恰在于它所指涉的那个环节——信号发出与承接之间的传递——在既有理论中被双端精细覆盖而中间落空。本文的贡献，不是宣示这个环节能够解释一切，而是将其首次推到可被理论审视和实证检验的台前。

5.4 一个必须被正面面对的悖论

在本文的论证架构下，有一层更尖锐的批评必须被直接面对，而非在结论中轻描淡写地带过。批评的核心指向回响饥饿理论可能的内在悖论：一方面，本文反复强调承接性回响的关键在于其“不可预测性”与“活人标记”——照护者的回应带有其个人的、真实的、不为孩子所预知的情感波澜；另一方面，本文又将回响饥饿诊断为当代教养实践的某种结构性后果，并在第四部分提出“回响场域”的实践方向。那么，我们是否在把一种真实的、不可预测的人类回应，变成一种新的教养规范——一种必须被“制造”出来的东西？如果是，那么“回响”本身是否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另一种第三方裁判系统——只不过这一次，裁判的标准从“你坚持了吗”变成了“你的回响里有真情实感吗”？

本文的回应是：这个批评切中了回响概念最深层的反讽——回响无法被规范化。任何试图将回响“操作化”为某种可观察、可训练、可评价的教养技术的尝试，都将使回响走向自身的反面。这正是本文在第四部分竭力避免的，也因此本文将实践建议定位在“场域条件”而非“行为技术”，并提供可观察的标志，仅作为照护者自我觉察的参考，而非外部的评判标准。但批评仍然成立，且无可回避，因为一旦某种关系质量被赋予了“对孩子的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规范性意义，照护者就不可

避免地会将它内化为一种自我评价的尺度——我做到回响了吗？我够格吗？——而这种自我审查，恰恰是回响场域所要排除的东西。

本文无力消解这个悖论，且认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理论“解决”的逻辑问题，而是“回响”作为一个规范性概念诞生时即已携带着的结构性反讽。本文的诚实立场是承认这个悖论，而非假装已经化解了它。这正是本文在实践部分强调“先接通自己”而非“优化回应技术”的来源——不是因为它提供了摆脱悖论的出口，而是因为它在悖论中划出了一条可能更诚实的路径：先停止问“我做对了吗”，先去感受自己的身体里正在发生什么。但这是否能够真正地在“承认回响之重要”与“不以回响作为新标准进行自我规训”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这绝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每一个照护者在真实的关系中需要持续面对的、极其艰巨的实践张力。

[7]

5.5 证伪条件

最后，本文必须给出一个明确的证伪条件。如果以下现象被系统性地观察到，回响饥饿理论就需要被修正或放弃：在亲子互动中，可以独立地测量到高频率、高质量的承接性回响（由经过训练的独立观察者依据可操作化指标编码，而非仅凭家长自述），同时孩子被测量到具有完整的主体感迹象（自发行为、情绪表达、选择偏好），但这些孩子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中，依然表现出与回响饥饿组无异的“无动力、无兴趣、无所谓”状态，那么本文所主张的因果解释——即回响饥饿是内驱力衰退的关键机制——就需要被推翻，或至少被严重限缩其适用范围。

此外，如果纵向研究发现，一些在早期经历了长期回响缺失的孩子，在关键发育期过后（例如进入青春期后），在没有显著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恢复了主体感——具有充分的“我想做某事”的动机、且能够享受其过程——并且这种恢复不是由于找到了承接性回响的替代源（如一段重要的友谊、一位关键的师长），那么本文关于回响饥饿对主体感组织过程具有结构性损害的论断，就需要被重新审视。

理论的尊严，不在于它永远不会被驳倒，而在于它把自己的死法放在了一张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桌上。

在这些系统性的证伪数据出现之前，本文所刻画的那幅图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与孩子相处的细微时刻里，加以警惕：你是承接了他的信号，还是在检查清单上划掉了一个叫做“回应”的格子？那个在你面前、眼中闪着不确定光芒的孩子，他正在对你发出的，不仅是一个需要被回答的问题，更是一种需要被接住的、关于他自身存在的古老试探。你接住了吗？

附论一·最近邻切割（续）

本节由编辑部在发表前补写。用意只有一个：把原稿已切过的近邻之外、那些最可能整个吞掉本文核心概念的理论对手请上场，逐一走完「承认占位 → 剩余分工 → 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三步。凡切不动的，如实写明切不动。

1. 与毕比「中度匹配最优」模型的分离：本文说的不是匹配度，是匹配中必须留出的那一份不可预测

承认占位。本文第二节与斯特恩的情感调协做过对质，但发展心理学中真正逼到本文核心的，是毕比与拉赫曼（Beebe & Lachmann）在母婴微观互动研究中提出的中度匹配模型：母婴之间的互动偶联（interactive contingency）与最佳发展结果之间不是单调递增关系，而是倒 U 形——过低的偶联意味着忽视，过高的偶联同样预示不安全依恋，因为它剥夺了婴儿的自我调节空间。这个模型必须被承认为本文最强的现成占位：它已经在实证层面否定了「回应越准越好」，并且给出了「留白也是构成性的」这一判断。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中度匹配模型测量的是偶联的强度分布，其自变量是「母亲的回应有多大程度可由婴儿的行为预测」。它关心的是量。本文所说的承接性回响，关心的是回响中携带的那份来源——那道波澜是否带着回响者本人此刻的、不可被脚本复制的形状。这两件事在数据上可以完全分离：一位母亲的偶联度可以精确落在中度区间，而她的每一次回应都来自一套被内化的育儿脚本（「此时应当蹲下、平视、复述他的感受」），于是偶联度合格、可预测性也合格，唯独那份「你碰到了我」的信息量为零。中度匹配模型无法把这种母亲与另一位偶联度相同、但每次回应都真实地被孩子扰动了一下的母亲区分开来。回响饥饿命名的，正是这个被偶联度指标穿过而未被捕获的维度。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选取偶联度均落在中度最优区间的两组母婴，按回应的脚本化程度分层（甲组高脚本化：回应内容高度可由育儿知识预测；乙组低脚本化：回应内容含大量因母亲当下状态而异的成分）。中度匹配模型预测：两组在依恋安全性与后续自主性指标上无系统差异，因为决定性变量偶联度已被控制。本文预测：乙组儿童在学前期的自发探索发起频次显著更高，且在「行为—世界反应」的因果效能感任务中表现更强。若两组在这些指标上无差异，则回响饥饿可被中度匹配模型吸收，本文的独立性不成立。

2. 与冯纳吉「标记性镜映」的分离：标记解决的是归属，回响解决的是效能

承认占位。温尼科特的抱持在本文第二节已被切分，但那一线索上最精细、也最贴近本文的当代成果，是冯纳吉（Fonagy）与塔吉特等人提出的标记性镜映

（marked mirroring）：照护者在反映婴儿情绪时，必须给这份反映打上一个「标记」——夸张的语调、略微失真的表情——以使婴儿能够辨认出「这是妈妈在表现我的情绪，而不是妈妈自己的情绪」。未加标记的镜映会导致婴儿把照护者的情绪误认为自己的，是心智化发育受损的一条已被论证的路径。这个理论与本文共享同一个直觉：回应不能是一面完美的镜子。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标记的功能是划界——它解决的是归属问题（这份情绪是谁的），其失败后果是自体与他者的混淆。本文所说的回响之不可预测性，功能完全不同：它不划界，它传递效能（我的信号在你身上引起了一个连我也预料不到的变化），其失败后果不是自体与他者的混淆，而是「发出信号这件事没有意义」这一信念的沉积。两者在临床图景上可以正交：一个接受了充分标记性镜映的孩子，可以清楚地知道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母亲的，具备良好的心智化能力，同时依然从未体验过自己的一个模糊冲动让另一个人的眼睛亮起来。前者是分化，后者是效能——这正是本文要开垦的那块地。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对心智化能力（以反思功能量表衡量）均处于高位的两组学龄儿童，按其照护史中回响成分的估计密度分层。心智化理论预测：反思功能既已高位，两组在自我发起行为与兴趣持续性上不应有系统差异，因为标记性镜映的发育任务已经完成。本文预测：低回响组仍将在「无外部邀请条件

下的自发兴趣发起」上显著更低，尽管其反思功能完好。若反思功能可完全统计性地中介掉回响密度对自发发起的影响，则本文的概念是冗余的。

3. 与特罗尼克「失匹配—修复」模型的分离：本文的重心不在修复率，在修复所携带的个人形状

承认占位。特罗尼克的静止脸实验与失匹配—修复（mismatch-repair）模型在本文第二节已被提及，但仅作为背景。它值得一次正面对质：该模型的核心发现是，正常母婴互动中约七成时间处于失匹配状态，发育的关键不在于避免失匹配，而在于修复的频次与速度——反复经历「断裂—修复」的婴儿，会形成一种「关系可被修好」的正向预期，这正是韧性的原型。若本文所说的回响不过是修复的另一种说法，则其贡献将退化为对既有模型的重新命名。

剩余分工。剩余的分工在于：修复模型的因变量是关系状态的恢复，它衡量的是断裂之后回到同步所需的时间。承接性回响衡量的不是回到同步，而是在那次接触中，回响者本人是否真的被移动了一下。一次高效的修复完全可以由一套熟练的安抚程序完成（转移注意、抱起、哼唱），关系状态迅速恢复，修复率漂亮，而回响者本人纹丝不动。本文的判断是：修复率高而回响贫乏的照护，会培养出一个相信「关系总能修好」、却不相信「我能让世界发生一点没被安排过的事」的孩子——这两种信念在既有量表上无法被分开测量。

可裁决预测。方向相反的可裁决预测：在修复率相当的两组母婴中，按修复动作的程序化程度分层。修复模型预测：修复率既已相当，两组在幼儿期的挫折恢复与关系信任指标上应当趋同。本文预测：两组在关系信任上确实趋同（这正是修复模型的正确之处），但在「因果效能感」相关任务上分化，程序化组显著更低。若两类指标同向变动、无法分离，则回响饥饿应被并入修复模型作为其一个子情形。

附论二·证伪条件

以下条款由编辑部与原稿的自陈证伪条件合并整理。任何一条被严格的经验研究证实，本文的相应主张即应被修正或撤回。

1. 若在控制照护者回应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偶联度之后，「回应中不可预测成分的密度」这一变量不能对儿童的自发探索发起频次提供额外的解释方差，则回响饥饿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构念。
2. 若能够构造出一种完全脚本化、可被逐条培训、且回应内容对儿童行为高度可预测的照护程序，而接受该程序的儿童在自发兴趣发起与因果效能感上与自然照护组无差异，则本文关于「不可预测性是构成性的」这一核心主张被证伪。
3. 若被判定为回响饥饿的儿童，在成年后进入一段高回响的亲密关系或师徒关系后，其自发发起能力可在一年内恢复至常模水平，则本文关于该缺失具有沉积性与慢性的定性应被下调为可逆的状态性描述。

注释

[1] 本文所涉亲子互动场景及儿童行为描述，均为综合典型性实例，用以例示概念机制，并非对特定个体或家庭的实录。部分细节经过了匿名化、合成与简化处理，不宜作为经验研究的数据使用。

[2] 文中提及的“亲自校准”概念及相关前期工作，系陈晓艳、高鹏、季春雷等研究者在内部研讨中形成的共同框架，尚未以独立论著形式公开发表。本文的问题意识即由此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到“校准者”本身的生成条件。关于“回响饥饿”概念与教育心理学中“代理习得性无助”“支架式教学”“自主支持”等已有实证文献的关系，需另文详述，非本文篇幅所及。

[3] 此处描述的“硬场景”系基于发展心理学相关实验范式（如Tronick等人的“面孔静止”实验）的逻辑进行的概念性构造，旨在极端条件下检验构念的可分离性，并非引用某一项具体的已发表个案报告。

[4] 正文所引互动失调比例（约70%），系发展心理学领域对Tronick等人经典研究的常见概括。此处取其概数，旨在辅助说明互动修复机制，非精确统计报告。

[5] “认知平滑”“时间格子化”“第三方裁判系统”等术语，是作者对当代教养实践中常见互动模式的概括性命名，并非对某一既有学术概念的严格沿用。本文通过这三种机制的分析，揭示其制造回响饥饿的具体过程及其互构关系。

[6] 本文第四部分提出的“回响场域”及可观察标志，意在提供一种方向性眼光和自检思路，而非可标准化的操作程序。任何将其转化为“正确回响技术”或教养绩效指标的尝试，都将背离本文的核心立场（并见第5.4节对理论反讽的讨论）。

[7] 有关“回响”概念本身可能陷入规范性反讽的深层讨论，详见第5.4节。这一内在悖论构成了本理论无法彻底消解的张力，要求实践者在“重视回响”与“不以回响进行自我规训”之间保持自觉的清醒。

参考文献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Deci, E. L., & Ryan, R. M. (1985).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 Plenum Press.

Deci, E. L., & Ryan, R. M.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Rothbart, M. K. (2011). *Becoming Who We Are: Temperament and Personality in Development*. Guilford Press.

Stern, D.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Basic Books.

Tronick, E. Z., Als, H., Adamson, L., Wise, S., & Brazelton, T. B. (1978). The infant's response to entrapment between contradictory messages in face-to-face interac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Psychiatry*, 17(1), 1-13.

Tronick, E. Z. (1989). Emotions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infa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2), 112-119.

Winnicott, D. W. (1965). The Maturation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本次发表前补入（对应附论一各节，均为真实文献）：

Beebe, Beatrice, and Frank M. Lachmann. Infant Research and Adult Treatment: Co-Constructing Interactions. Hillsdale, NJ: Analytic Press, 2002.

Jaffe, Joseph, Beatrice Beebe, Stanley Feldstein, Cynthia L. Crown, and Michael D. Jasnow. "Rhythms of Dialogue in Infancy."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66, no. 2 (2001): 1-132.

Fonagy, Peter, György Gergely, Elliot L. Jurist, and Mary Target. Affect Regulation, Ment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lf. New York: Other Press, 2002.

Tronick, Edward Z. "Emotions and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in Infan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no. 2 (1989): 112-19.

关于本文创新智商标注

本文的盲评分为 **132**（评分者未参与本文写作，具备评分资格）。附论一与附论二由编辑部补写，补写后的 **137** 是**修改设计目标**，不是认证分——按本栏规程，任何人不得为自己参与撰写的文本出具认证分。该分数**待独立复核**。评分口径为 SDE 创新智商五维（S 结构精确度／D 差异锐度／E 纠缠深度／I 不可还原性／F 可证伪性），参照语料与评分截至日随复核一并公布。